



相似之人

我和进屋男子的相似程度令人难以置信!就像看到另一个自己。当眼神交会,我们彼此致意。但是,他看来一点也不惊讶。因此,我判定他其实不是那么像我,他留着胡子,而且我似乎已经忘记自己的脸长啥样了。当他坐下来面对着我时,我想起自己有一年没照镜子了。

就在这时,门开了,我被传召入内。帕夏起身,站在模样和我相似的男子身边,让我亲吻了他的衣襟下摆。当他向我表示问候时,我想要说说自己在狱中的苦难,以及希望回国的想法,但他连听都没听。帕夏似乎记得我对他说过,我有科学、天文学及工程学的知识——那么,是否知道关于射向天空的烟火及火药的事?我马上回答知道。但当我看着另一名男子的眼神时,刹那间,我怀疑他们为我准备好了陷阱。

帕夏说,他筹划的婚礼将无与伦比,会让人准备一场烟火表演,但它必须与众不同。以前苏丹诞生时,一名已经去世的马耳他人和玩火魔术师们一起准备了一场表演,那位面貌和我相似的人——帕夏只简单地称他为“霍加”,意指“大师”——也和他们一起

名家新作

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第一部历史小说。年轻的威尼斯学者被俘虏到伊斯坦布尔,成为土耳其人霍加的奴隶。二人竟然外貌神似。他们联手苏丹发明了一件用来对抗波兰与其西方盟军的战争武器。武器在围攻“白色城堡”时上阵,两人在城堡的身影底下,霍加选择了逃离,奔向他的想象城市威尼斯,威尼斯人则作为替身留了下来继续霍加的生活……

(土耳其)奥尔罕·帕慕克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友情推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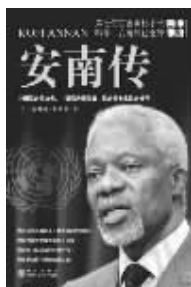
干过,对这些事务略知一二。帕夏认为我可以协助他,说我们能彼此互补。如果展示出优秀的表演,帕夏会给我们奖励。我觉得时机已经成熟,便大胆地提出我希望回国。帕夏问我,来到这里之后,是否和女人睡过觉。听到我的回答后,他说,如果连那种事都不做,那自由对我又有何用?然后,他转向他称为“霍加”的和我相像的人:责任归他。我们随之离开了。

上午时分,当我走向与我相似之人的家时,我以为自己没有什么可以教他的。但是,他的知识显然不比我强。此外,我们的看法都一样:调配出好的樟脑混合物是整个问题的所在。因此,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仔细妥委依比例与分量调配的实验性混合物,在苏尔迪比的高大城墙附近向夜空发射,再观察推衍出结论。当工人点燃我们准备的“火箭”时,孩子们带着敬畏的眼神观看着,我们则站在阴暗的树下,焦虑地等待着结果;而数年后,我们在白天测试那个不可思议的武器时,也是这样的情景。后来有些实验是在月光下进行,有些则在漆黑的夜里,我用一本小册子记下观察结果。天亮前,我们会回到霍加面朝金角湾的房子,仔细讨论实验结果。

他的屋子既小又有压迫感,平凡乏味。屋内几乎没有家具,但每次进屋,我总有一种紧迫感,并被奇怪的忧虑感淹没。或许,这种感觉是源自这名男子:他在监视我,似乎想从我这里学到点什么,但还不确定那是什么。他要我叫他“霍加”,因为他不喜欢和祖父有同样的名字。由于我不习惯坐在沿墙排列的低睡椅上,所以站着和他讨论我们的实验,有时烦躁地在屋内来回踱步。我相信霍加享受这个情景。只需借由油灯的微弱光芒,他便能尽情地坐着观察我。

当我感受到他看着我的目光时,对于他并未察觉我们的相像,我感到更加不自在。我曾数度认为,他其实发现了,只是假装没有。就好像他正在玩弄我,正在我身上从事一个小小的实验,获取我不明白的一些讯息。因为开始几天,他总是那样端详着我:仿佛在学些什么,而他学得愈多,就愈好奇。但是,他似乎有点犹豫是否要采取下一步行动,进一步深究这种奇怪的知识。就是这种悬而未决让我感到压迫。

他察觉到了我的压抑,我努力克制住自己,心想如果我们能毫无意外地成功交出烟火表演,他们或许会准许我返乡。



卢旺达污点

也有一些反对者对科菲·安南不屑一顾,他们认为他手上沾满卢旺达人的鲜血。他们的蔑视数年来从未消退。他们反对安南竞选连任秘书长,反对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,不断要求他辞职。

经常为民权事业而斗争的专栏作家纳特·亨多夫在2001年称,“安南先生曾任联合国维和行动办公室的主管,他原本能够阻止1994年卢旺达对80万图西人及其同情者的屠杀。”一个卢旺达幸存者团体1998年致信安南,认为他应为这场可怕的屠杀负“重大责任”。两位丹麦研究人员2001年组织了一次请愿,谴责安南“严重地辜负了受害者”。

对安南最明确、翔实的批评来自现任《巴黎评论》(The Paris Review)的编辑菲利普·古雷维奇。他在著名的《纽约客》上发表了几篇文章,称安南为这场危机中的“恶棍”。古雷维奇指出,当来自前线的联合国军事指挥官发来电报,警告针对卢旺达图西族的种族仇杀即将到来时,安南未能“敲响警钟”。有人对此不以为然,因为当时以美国马首是瞻的联合国安理会不

人物传记

科菲·安南缔造了联合国的辉煌时代。在长达四十多年的联合国生涯中,他见证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,包括波黑战争、海湾战争、科索沃战争、9·11事件等。此书的作者是《洛杉矶时报》资深撰稿人,他以敏锐的眼光和洗练的文笔,让人们不仅了解当代国际风云的内幕,也了解了联合国的运作。

【美】斯坦利·梅斯勒 著 中信出版社友情推荐

会采取任何行动,而古雷维奇对这种说法却嗤之以鼻。“虽然安南扣留了军队指挥官的警告没有造成大的伤害,且这一点未得到证明,但没做错事离对事情还有很远的距离,这却是事实。”古雷维奇在2003年《纽约客》的一篇文章中写道,“……我们怎么就能确信安南提前几个月‘敲响警钟’就毫无用处呢?他甚至没有尝试一下,我们又怎么知道这一点呢?”

毫无疑问,安南对卢旺达事件深感内疚。西班牙驻联合国大使胡安·安东尼奥·亚内兹-巴尔努维奥在卢旺达危机期间是安理会成员国代表。他后来说:“卢旺达的经历深深地影响了他。虽然我不敢肯定安理会会做什么事情,但那封电报应该拿到安理会,让安理会全体成员注意。现在每当谈到种族仇杀时,他都非常情绪化。他对卢旺达的经历非常在意,深感内疚。”他说这些话时充满理解之情。

安南本人接受独立委员会的调查结果,即他领导的维和行动办公室和联合国其他成员,包括安理会的各成员国政府,在这场危机中未尽到相应的职责。对这一失败的思考时常萦绕在他的脑海之中。

2004年,他对美国公共

广播公司电视节目《前线》的一位记者说:“对我本人来讲,这是一次非常痛苦和伤心的经历,而且我认为在某些方面对联合国也是如此。这是难以忘却的事情。”

但是我们必须客观地看待这种内疚和责难。卢旺达仇杀不是一个简单的善恶事件。这个问题及其历史背景非常混乱和复杂,当时的联合国文化也是这样,这导致在如此可怕的危机之中联合国竟然如此无所作为。应受指责的人不只安南一人。甚至参加战斗、保护图西族人的图西族士兵也不能逃避责任。科菲·安南可以心怀内疚,但有一些人更应受到指责,包括美国政府。

但是,不管情感上曾经有过多少痛苦,安南还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做事。他严肃、保守、谨慎,熟悉美国政治,忠于联合国决议,讨厌戏剧性姿态。这场危机也让安南认识到联合国的弱点。联合国自己没有力量,只有道德权威。它完全取决于安理会成员国,尤其是美国。如果美国对某项决议表示冷漠、犹豫或反对,联合国将无所作为。当美国和联合国秘书长步调一致时,联合国就能做到最好,而1994年,当无数卢旺达人惨遭屠杀时,他们却立场迥异。



酒吧女

我又成了待业青年、家庭主妇。一天,我在报上看到一酒吧招工广告。上面赫然写着:“无需经验”,这对我有很大吸引。于是,我按报上的号码打了电话。接电话的是一个普通话说得很标准的男人。他叫Victor,酒吧老板,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。

第二天晚上九点左右,一小伙子来接我上班。一坐上车,我就开始打量他,发现他很年轻,约十八岁。他意识到我在看他,转头用怪怪的国语对我说:“你是不是发现我长得有点怪,我是混血儿,我爸爸是葡萄牙人,我妈妈是广东人。”

很快我们就到了工作地点。其他人都没到,他麻利地重新排列组合桌椅,我要帮他忙,他说不要,这不是女孩子做的。我笑问他:“那什么是我该做的呢?”他说:“Victor会告诉你的。”

半个小时后Victor来了。过了一会儿,两个长得挺漂亮,打扮也很入时的女孩也来了。她们对我很友好。一个小时过去了,一个客人都没有。我有点心慌,不知所措地坐在那儿。十二点了,有五个年轻男子走了进来。待他们坐定后,我赶

纪实文学

这是作者海外十年生活的浓缩。十年前,作者和丈夫移民到加拿大,这些年来,打工、求学、生活,作者将在国外奋斗的种种酸甜苦辣娓娓道来。因为亲身经历,所以字字透着真实,因而感动我们。

徐莉 著

快跑到吧台要帮端饮料和酒。男孩说:“我是Waiter,这是我做的事。”就在我不知所措时,我听到Victor叫我。我跑过去,Victor对两个女孩说:“今天是Lily第一天上班,你们带她过去和客人聊聊天。”我只好跟着她们坐到客人旁边。

回到家,我告诉老公我的感受,感觉自己有点像三陪。老公说:“那就别去了。”我说:“明天我再去一次,把今天的工钱拿到。”第二天,到了那儿发现老板Victor已经先到了。他经过我身边时,打量我一下,突然对我说:“Lily,明天你换件衣服。”我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穿着,一条牛仔褲,一件宽松粗线毛衣。我不高兴地回道:“换什么衣服?”他指指我身旁的黑衣女郎:“像她那样风格的衣服。”我马上摔过去一句:“我没有。”他看看我笑笑地走开。过了一会儿又急急地跑到我身边对我小声说:“Lily,帮我过去照顾一下那个客人,他不想跟那两个前卫的女孩聊天。”

我看看老板,他生意做得也不容易,就都帮他吧。我和那位自称姓丁的客人聊得很愉快,时间很快过去了。他对我说:“时间不早了,你不是说你不想在

这干了吗,那我送你回去,你愿意吗?”我点点头便跟着他往外走,混血男孩快乐地跟在我身后悄悄地对我说:“他很有钱。”我说:“你怎么知道?”他说:“你看他给我的小费。”说着把手上拿着的钱在我眼前晃了晃。

当车开到我所住的小白楼前,我对他道了谢,就准备开门离去。他说:“等一等。”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对我说:“这里面有一千五百加币。我想这一千五百够你两个月生活费了。明年一月去上学吧。打这些工对你没有任何好处,别浪费时间,好好复习功课。”我听了他的话心里万分感激:“谢谢你,话我记住了,但无功不受禄,谢谢你一片好意。我走了。”刚要推车门,他一把拉住我,态度很诚恳地对我说:“你听我说,我在加拿大受了教育,我很喜欢这个国家。你收下这些钱只当是替国家收税。”我听了这话忍不住笑了起来,心想:什么逻辑?我下了车,看着手中的信封,心里百感交集。在我三十年生命历程里,得到了太多的友爱。也正因为这些,在生活的道路上无论碰到什么样的困难,我都尽力坚守做一个诚实和善良人的信念。



健康指南

我们的膳食是否科学合理,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。分析表明,肥胖等引致慢性病的重要因素的发生率在大幅增加。这将严重影响我国居民的健康素质、健康寿命,加重疾病负担。看来,合理的膳食结构对健康很重要。可是,我们到底该吃什么,怎么吃呢,看看百家健康讲坛专家怎么说……

刘克玲 戎东贵 编 江苏美术出版社友情推荐

茹毛饮血害大病

俗话说“民以食为天”,“人是铁,饭是钢,一顿不吃饿得慌”。饮食是人类生存的基础,合理膳食也是维持人体健康的重要保证。中国传统的饮食文化,讲究荤素结合,即“五谷为养,五畜为益,五果为助,五蔬为充”,吃“野味”从未成为过中国饮食文化的主流。

然而,近些年来有些地区、有些人不讲科学膳食,滥捕、滥烹、滥吃野味成风,不文明的饮食习惯引发了不少疾病。人类捕食野生动物,曾付出了极大的代价,经过上万年不断筛选,反复淘汰,才留下现在供人们日常食用的猪、牛、羊、鸡、鸭、鹅和鱼、虾等。举个例子,有些人吃野味吃到老鼠身上。比如广东有段时间非常流行的“三吱”,就是吃尚未长毛的小老鼠。殊不知,鼠类可以直接把病菌传给人,或通过体外寄生虫间接传给人,起传播媒介和保菌、保毒作用。

现在已知的家栖鼠类,至少能传播35种疾病。在我国,常见的鼠传播疾病主要有鼠疫、钩端螺旋体病、流行性出血热、鼠源性斑疹伤寒、血吸虫病等。这些传染病都比较严重,其中鼠疫在我国

《传染病防治法》中被列为甲类传染病首选,也就是我们常称的1号病。

还有流行性出血热,由它易误诊为普通感冒,发病晚期肾脏受损出现肾功能衰竭,所以病死率较高。从1999年以来,患此病的人数仍居高不下,且在全国各地流行。

还有与鼠类关系极大的钩端螺旋体病,由于主要影响青壮年农民(主要是下田割谷),对农村劳动力影响大,该病的黄疸出血型(肺型)若不及时抢救,病死率很高。

吃其它野生哺乳动物如野猪、熊、狐狸、狼、狮子、老虎等)也会传染给人不少病,其中较为严重的肺吸虫病、旋毛虫病就是它们传播的。

随着一股“回归自然”的潮流,近几年来,社会上时兴吃生蔬菜、生肉、生鱼、生虾(醉虾)。甚至吃起活的哺乳类动物,连猴子也活着生吃。活剥生吃,非常残忍,毫无慈悲怜悯之心。

殊不知,人类进化过程中,为什么将吃生食逐渐变成吃熟食,我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熟食对人安全。可现在倒退回去了。因而近些年来,由于生吃、活吃野生动物惹来不少新病。如吃青蛙,容易感染曼氏裂头绦虫病,引起失明、癫痫;吃生溪蟹、

虫刺蝟等引起肺吸虫病。

我在四川工作时,曾收治了不少肺吸病患者。这个虫全身乱钻,如钻进脑子里就抽风、偏瘫,钻到肺里就引起咯血;吃生鱼感染华支睾吸虫病(又叫肝吸虫病),此虫喜欢寄生在肝内大小胆管及其分支,引起阻塞性黄疸,继而发展成胆汁性肝硬化。

广东人爱吃生鱼粥。如果制作不好,很容易引起肝吸虫病。吃未煮熟的病猪肉(米猪肉)、病牛肉,人易分别感染猪肉绦虫病或牛肉绦虫病。患这种病的人,大便时不断拉出“面条”样东西(绦虫的白色孕节片)。我曾经治疗过这类病人,用药驱虫时,一次可驱出2米多长的虫体,如果不把虫头打出来,过不了多久,这条虫又恢复原样。成虫可长期寄生,在人体内可活30-40年。

这里,我还想谈谈生吃猴脑问题。暂且不说这种吃法的残酷性,一般人难以接受,单从影响健康的角度就受不了。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有些人为了“强身”“清火”“明目”,开始生喝蛇血、生喝龟胆汁。可是没喝两年,不少人喝出了寄生虫病,其中有一种是鞭舌虫病。这种寄生虫因不常见,很容易误诊,到晚期治起来也很困难。